

梁漱溟的“文化自救”与当今和谐社会的养成^{***}

□时广东 王 军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要] 目前,我国正在从各方面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这是一个十分浩大而深刻的全民工程,它代表着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向。然而,实现这个工程,需要一种合力,这种合力的形成,不能只是着眼在现实社会中进行各种资源的挖掘与整合,历史上众多的思想文化遗产,对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现实发展,蕴涵着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60年前,梁漱溟的文化自救,实际上也就是企图通过这种自救的形式,使中国社会走向一种和谐发展的自新之路。这种文化自救,对今天中国创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很深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和谐社会; 民族品性; 文化自救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08)03-0068-04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考察,其表现主要在经济范畴里的制度变迁。因为,随着制度的调整,必然带来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自然便构成了体制转型中的社会和谐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在注重把利益结构从理论上视为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似乎忘却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由自身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民族品性,对和谐社会能否建成的重要影响。

—

晚清以降,缘于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中国老社会由于新环境的刺激压迫而走向不幸的命运,考验国家民族的难题步步接踵而来,不少仁人志士从各方面仓惶效法西方以图自救,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洋务、康梁等人的变法、孙中山等人的革命,然此等民族自救运动一起再起,却一次次先后失败。每一次运动都激起无数中国人的热情,但一次次的失败却又使每一个国民心上都蒙上一片灰影,致使民族的生命力由于失望而被削弱。于是,先进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乃是进步的最大障碍,由此新文化运动蓬

勃兴起,不少人把传统中国的一切都看着是漆黑至深的一个大染缸,“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领略,犹之犬羊……”(参看傅斯年:《新潮发刊趣义书》)更有甚者,不少人主张完全抛弃传统文化,认为:东西文化“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必须以全盘西化来拯救中国(参见1915~1919年间的《新青年》杂志)。然而,由于全盘反传统文化的人,其理论体系的内在欠缺,以及理论体系在现实中国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再加上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社会内部所暴露出来的那些令人生畏的问题,迫使中国人的关注点不得不从外部世界转入内部。于是,在中国便出现了一批所谓“新传统主义者”,企望能够在一种比较适度的范围内中西调和,重建中国文化的新体系^[1,2]。梁漱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曾毫不隐讳地承认中国文化在整体性上“已经撞在墙上无路可走,如果要开辟新局面必须翻转才行。”^[3]但他也十分坚决地反对不能由此而将中国文化连根抛掉^[3]。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强调:任何民族,其“民族品性上的特殊之点大多由民族文化陶铸而成。”^[4]特别是当他看到潘光旦和庄泽宣等学者就外

* [收稿日期] 2008-02-28

** [作者简介] 时广东(1956—)男,历史学博士,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军(1957—)男,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人对中国人的种种看法(无论体质还是心理)的介绍,结合自己对国人的考察与分析,总结出了中国民族品性的十大特点。它们是: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与残忍;韧性与弹性;圆熟老到^[4]。这十大品性,梁漱溟认为无一不是中国文化所结之果^[4]。当然,探其这十大民族品性的源头,本身就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化所总结的七大特性和十四个特征^[4]。

民族品性实际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生活取向,而生活取向又表示着在一定文化气质的制约之下呈现出来的生活态度。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人们往往把那些属于文化模式和文化传统的东西称之为“性”,而把那些仅仅因社会制度和环境形成的东西称之为“习”。前者历久而稳定,后者则随时可以改变^[5]。很明显,梁漱溟所总结的民族品性,当属于前者。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这些“性”和“习”在某些方面,远比梁漱溟时代的民族品性所反映的问题严重得多。因此,在今天的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仍须下大力气改造民族品性。

二

如何改造民族品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结构自古以来有两大特点,一是“伦理本位”,一是“职业分途”。准确把握这两个特点,对于改造民族品性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梁漱溟的“伦理本位”是相对于西方的集团本位、个人本位而言,那么,“职业分途”则是相对于西方的阶级分化而言。他认为,“伦理本位只说了中国社会结构之一面,还有其另一面。此即在西洋社会,中古则贵族地主与农奴两阶级的对立,近代则资本家与劳工两阶级的对立。中国社会于此又一无所似。假如西洋可以称为阶级社会,那么,中国便是职业分途的社会。”^[4]在梁漱溟看来,中国自古以来虽然有贵贱贫富之分,但整个社会却在经济上、政治上没有什么阶级对立,自“战国而后,自中央到地方,一切当政临民者都是官吏,官吏之所大不同于贵族者,即他不再是为他自己而进行统治了。他诚然享有统治之权位,但既非世袭,亦非终身,只不过居于一短时之代理人之地位。……为自己而进行统治,信乎其为统治阶级;一时代理者,显见其是非。而况做官的机会,

原是开放给人的。”^[4]因此,中国历史上,战国以前是卿、大夫、士的阶级社会,而战国以后,统治者变为读书人和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和农、工、商一样,“在社会构造中有其职司专务,为一项不可少之成分。”^[4]这就叫着“职业分途”。梁漱溟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就不存在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其基本依据是,一、独立生产者的大量存在;二、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且常在流动转变;三、政治上的机会是开放的^[4]。正是由于中国社会无阶级对立,所以中国也就有了“不像国家”的特征。因此,中国实际上只有社会,而无国家,更准确地说,中国是“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融国家于社会”,“只是社会,不像国家”,“即社会以为国家”^[4]。由于中国是以周孔礼教启发理想,以礼教为法律,以政治为伦理,以职业代阶级,更以道德代宗教,把阶级国家融于伦理社会之中,故而“三千年来我们一贯精神是向着‘社会’走,不是向着‘国家’走。”^[4]

可以看出,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想寻找出中国历史之所以停滞不前与资本主义未能在产生的“文化的”和“结构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办法。就当时中国社会现状而言,梁漱溟的诊断与所开出的药方,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对比梁漱溟的分析,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伦理社会”和“职业分途”来考辨其社会结构了。今天的中国,尽管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多党派、多宗教、多阶层,社会因素繁多,社会资源丰富的社会,但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远比梁漱溟时代错综复杂得多。如何让它们和谐的存在与发展,是对国家和政府执政能力、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的一种严峻挑战和考验。

社会结构是否合理,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保证。当今中国社会的结构依然是两种独立的体系:一是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另一个是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社会。这两种社会,就目前而言,其存在和相互关系充满着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能否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和谐社会能否构建成功的关键。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现存的中国社会不仅是一个伦理的共同体,同时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结构在理论上往往被看作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并且决定着该社会的和谐程度。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源于社会权利的失衡。权利的市场

化,使得社会强势群体之间不仅形成了稳定而牢固的利益结盟关系,而且还积聚了相当的社会能量,从而在各方面影响着各级权力机关的利益决策,导致社会中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方面的能力,出现极大的差异和失衡,同时也形成了整个国家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因此,如何实现社会权利资源的合理分配便成为实现社会利益均衡的重要前提。

那么,当今中国的弱势群体何在?实际上主要还是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社会(当然,城市社会里也有一部分)。我国目前正处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二元结构并存的尴尬局面。一方面,农村的农民与城市的市民一直处在冲突和对立的状态之中,市民歧视农民,农民厌恶市民,农民无法在城市里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更无法利用社会资本来寻找更好的工作和发展;另一方面,农民在无法被城市和市民接纳的同时,更多的依赖和利用他们在家乡长期建构起来的社会资本——同乡关系、同学关系、亲缘关系等在城市寻求生存。这样一来,使得本身已经相当对立的城乡二元结构又添上了一层城市二元结构(主要指那些已经变成市民的农民)的复杂性。城市的阶层分布和阶层关系无限膨胀,而农村的阶层分布与阶层关系却日趋萎缩,这种不合理的状态,从根本上影响着当今中国整个社会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不同的阶层存在,它们之间就会有矛盾和摩擦,这种矛盾与摩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冲突。一个到处充满着矛盾与冲突的社会,是决不可能呈现和谐状态的。按照“和谐社会”的理论,决定和谐的首要因素应当是财富分配。不同的阶层,由于在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获得财富的方式与途径不同,他们之间所获得的财富,差别很大,有的还非常悬殊。高低悬殊的财富分配与获得的差异,必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安宁、不和谐。

人是社会化动物。尤其是现代人,无论在生理上还是智力上,都难以个人的形式来满足需要,而只能以群体的形式来满足人们多种多样需要。如今,对中国人民族品性的改造还得加上一个不能回避的因素——市场。就是说,在当今中国社会,只有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三者形成良性的互补、互动关系,改造民族品性,实现和谐社会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三

治理国家,政府是主导,又不可能是万能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办一切已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市场是社会资源调配的重要手段,但也不可能是全能的,市场泛化带来的很多社会弊端已众人皆知。因此,从管理社会的角度考察,社会组织应当是创建和谐社会的主力。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也不具备政府的职能,但是,社会组织往往以服务社会为天职,能够起到政府起不到也不应当起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中众多的社会组织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那些非政府、非赢利性质的社团组织,大都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们既具有协调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利益的功能,也具有协调国家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功能。其次,社会组织一般都具有自生自灭的特性,没有特权也不会强权,它们对社会的监督往往是客观的、柔性的、富有人情味和人性化的。再者,社会组织还具有智囊团、思想库的功能。近些年来国家出台不少深化改革开放大思路,有不少是来自社会组织的献计献策,这是社会民主化进程加快的表现。此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对民众的引导和教育,尤其对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调整与改造的功能,政府根本就无法替代。它们能够经常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起到化解矛盾的润滑剂、稀释剂的作用。有学者曾认为:现实“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由于腐败导致的政治危机,根本危机是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造成的精神的危机、价值的危机、信仰的危机。”^[6]这些危机的产生与存在,说到底还是当代中国民族品性的外化表现。

前几年,江泽民曾提出“以德治国”,其实这个“德”并不单纯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伦理概念,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如今,胡锦涛又提出“八荣八耻”的荣辱观,笔者以为,这是一种新的“以礼治国”的构想。如果说“以德治国”更多的是强调政治意识与自觉的治国方略,那么,“以礼治国”则是从民族品性的根上来调整治理国家和社会。很显然,“礼”和“德”是一脉相承的,两者强调的是一个中心内容,即深情地呼唤和企盼我们国家、民族悠远、深刻、富有忧患感的历史意识重新焕发新的时代风貌,使当今的中国人既富有以国家民族意识为本位的自我认知的政治、社会公德,同时又具有

开阔宏大的世界视野,为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世界中的命运和地位共同努力奋斗。

翻开中国历史,大凡在太平盛世,礼治功能,历来都是中国“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治国经典。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家庭的角度和社会的角度,礼治确属我国历来安定社会秩序的巨大标志,同样,它也是我国国民在今天的现代化生活中,由民族品性所引发的种种新困难、新危机得以解决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两千多年前,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何礼?”^[7]并倡导“仁者爱人”,强调天下人人若能“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8],也就是说,普天之下,不论门第出身,职位高低,富贵贫贱,谁具有克己复礼的工夫,谁就是仁人。天下有礼,也将会更有法,礼法同源。荀子就曾兼容儒法两家,提出“寓法于礼”的思想,他认为:“礼义生而制法度”,“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9]可见,礼有法的依据和充实,法有礼的内涵和神韵,将“以法治国”和“以礼治国”沟通融会,内化修己之道,外化治世之道,寓法治于教化,使国家法权和个人道德修养融为一体,礼治就必然具有“德”与“刑”的两重威力,此乃“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10]当然,中国传统的礼治,也是因时因事而不断变化的,它虽传承久远,但代代有递变,很难适应全面巨变的现代社会生活。故在今天的中国,若要讲求礼治,实施“以礼治国”,就必须“体常驭变”,将传

统礼治的内涵分类重新检讨,同时汲取古人和西方的优点加以变革,经过筛选、创建、整合的过程,重新构架出一套完全适应现代中国国民生活的新的价值体系,使礼治的每一个细微韵律都能与现代化的广泛生活相共流,最终导向整个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A],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C]. 北京:中华书局 1990.35.
- [2] 李大钊. 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A], 李大钊文集(上)[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60-561.
- [3]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A], 梁漱溟全集(第1卷)[C].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343,335.
- [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 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2-23,80,81,81,66,84,143,156,159,158,171,224.
- [5] 冯友兰. 新事论[M]. 重庆:重庆商务出版社,1943:161.
- [6] 何新.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M]. 北京:事实出版社,2002:433.
- [7] 《论语·八佾》.
- [8] 《论语·颜渊》.
- [9] 《荀子·礼论》.
- [10] 《荀子·议兵》.

Liang Shuming's "Cultural Self-Help" and the Formation of Today's Harmonious Society

SHI Guang-dong WANG Jun

(Univ. of Elec. Sci. & Tech.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China is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all aspects. It is a very vast and profound universal project, and it represents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direction. However, to implement this project, we need a resultant force and the formation of such a force can focus not only on the social reality in the various exploring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but also on the varieties of idealistic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long history that contains many things to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s an ancient nation. Liang Shuming's "cultural self-help" 60 years ago, actually attempting to use such a form of self-help to lead China to a rehabilitate road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still have very inspiring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Key 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national character; cultural self-help

(编辑 范华丽)

梁漱溟的“文化自救”与当今和谐社会的养成

作者: [时广东](#), [王军](#), [SHI Guang-dong](#), [WANG Jun](#)

作者单位: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8, 10 (3)

参考文献(10条)

1. [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 1990
2. [李大钊](#) [东西文明之根本并点](#) 1984
3.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993
4.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1987
5. [冯友兰](#) [新事论](#) 1943
6. [何新](#)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2002
7. [论语·八佾](#)
8. [论语·颜渊](#)
9. [荀子·礼论](#)
10. [荀子·议兵](#)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sb-shkx200803017.aspx